

# 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

谢灼华

## 一、胡应麟与二酉山房

胡应麟，字元瑞，浙江兰溪人。生卒年不详。明万历丙子（1576）中举，他的著作《少室山房笔丛》的《三坟补逸》序作于万历甲申（1584），《经籍会通》序作于万历己丑秋（1589），《玉壶遐览》序作于万历壬辰仲冬（1592），可知是活动于万历年间的作家。他与焦竑、杨慎、陈耀文齐名，是万历四大博学家之一。诗文得王世贞赏识，并得到王的提携成名。与李维桢、屠隆、魏允中、赵用贤等称“末五子”。著作集有《少室山房类稿》一百二十卷，又《续稿》十五卷。另有笔记杂著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四十八卷流传于世。传记附《明史》王世贞传后。

胡应麟中举后，屡试不第，固而遍游南北，交结书友，回到老家，筑室山中，藏书四万多卷，号曰二酉山房。

二酉山房藏书是胡应麟自己长期积累的。王世贞谓：“余友人胡元瑞，性嗜古书籍。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，君故宦薄。而元瑞以嗜书故，有所购访，时时乞月俸，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，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。……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。录其余资以治屋而藏焉。”这当然是作为友人的赞美之词。但胡应麟确是从长期购访中历尽千辛万苦，才积累了达四万卷的藏书。

“余自髫岁，夙婴书癖，稍长，从家大人宦游诸省。遍历燕、吴、齐、赵、鲁、卫之墟。补缀拮据，垂三十载。近辑山房书目，前诸书外，自余所获，才二万余。大半穷蒐委巷，广乞名流，录之故家，求诸绝域。中间解衣缩食，衡虑困心，体肤筋骨，靡所不惫。收集仅兹。至释、道二藏，竟以非力所及，未能致也。”（引自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以下未注明者均引自该书——笔者）

“张文潜《柯山集》一百卷，余所得仅十三，盖钞合类书以刻，非其旧也。余尝于临安僻巷中，见钞本书一十六帙。阅之，乃文潜集，卷数正同。书纸半已泯灭，而印记奇古，装饰都雅，盖必名流所藏，子孙以鬻市人。”胡应麟正欲购买，以补全帙，但当时身上“不持一钱”，他算计囊中有绿罗二匹，不一定能买下，又立即“解所衣乌丝直裰青蜀锦半臂罄之，”正在成交时，被官长勾唤，故约定于次日买进。当夜，胡“通夕不寐，黎明不中辍访之，则夜来邻火延烧，此书倏煨烬矣。”他“大怅惋弥月”。

胡应麟也曾记载与同时代藏书家交往之情况。

“王长公（王世贞）小酉馆，在弇州园淳风堂后，藏书凡三万卷，二典不与。构藏经阁贮焉，尔雅楼皮宋刻书皆绝精。余每读九友歌，辄泠然作天际真人想。”

“次公（王世懋）亦多宋梓。一日，燕汪司马，尽出堂中，并诸古帖画卷列左右，坐客应接不暇。”

“邨下宗正灌父，最蓄书，饶著述，宾客倾四方，尝餉余秘籍数种。”

“黎惟敬博雅好古，尝罄秘书俸入。……余有元人陈君采、柳文肃二集。黎过谷水并携去，约刻成寄余。余以二集刻本遽焚，~~因举贖俸完此举。~~”

童子鸣，“藏书二万五千卷。余尝得其目，颇多秘帙，而猥杂亦十三四。至诸大类书，则尽缺焉。”

祝鸣皋，“里中友人祝鸣皋，束发与余同志，书无弗窥。每燕中朔望日，拉余往书市，竟录所无，卖文钱悉输贾人，诸子啼号冻馁罔顾。”

胡应麟谈到与王世贞兄弟的交往，谈到黎惟敬、童子鸣、祝鸣皋等时，曾称四人“俱余生平同志，余筐笈所载，往往与互易者。”

谢在杭亦说到胡应麟藏书之收集情况。“胡元瑞，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。虞藏书数万卷，贮之一楼。在池中央，以小木为杓，夜则去之。标其名曰‘楼不延客，书不借人。’其后子孙不能守，元瑞噉以重价，给金尽室载去，凡数巨舰。及至，则曰吾贫不能偿也，复令载归。虞氏子既失所望，又急于得金，反托亲识居间，减价售之，计所得不什之一也。元瑞遂以书雄海内。”（谢在杭《五杂俎》卷十三）按谢肇淛之记载，可知胡应麟在积书过程中是要尽手腕，巧取虞氏藏书，其手段是卑劣的。

胡应麟回到家乡，刻意于自己藏书楼的建设。王世贞说他建房而藏书，“屋分三楹，上固而下隆其趾，使避湿，而四敞之，可就日。为庀二十又四，高皆丽栋，尺度若一。”可见，当时的二酉山房之建筑是充分考虑了采光、避潮，而楼内设备亦极讲究的。明代后期，藏书家总结历代楼多厄於水火之灾，故讲求书楼建筑之避火防灾以及防虫防潮等问题。宁波天一阁之建设可以看出其技术方法之讲究，胡应麟广交书友，遍览南北书家，故其书楼建筑颇有特色。

胡应麟把明代藏书家略分数等，一好事家“列架连窗，牙标锦轴、务为观美、触手如新。”二赏鉴家“枕席经史、沈涵青绡，郤扫闭关、蠹鱼岁月。”那么胡应麟属于那一类呢？据王世贞对胡之记载，他是具有赏鉴家之风的，但胡应麟藏书为了实用，即为自己编纂、考证、写作而收集藏书，应用藏书，这是值得称道的。

胡应麟自称平生无癖好，唯独嗜书。他对书到了迷、痴的地步，他信奉宋代藏书家尤袤的信条：饥饿时把书当作食粮，口渴时把书当作饮料，诵读时可以当音乐歌曲来欣赏，阅览时可以当作奇花异草来观览。甚至把书当作陶冶性情培养心性的东西，忧愁时借书以解忧，悲愤时借书以解忧愤，甚至患病时亦借书籍得以康复。所以王世贞称他的书斋里“书之外，一榻、一几、一博山、一蒲团、一笔、一砚、一丹铅之缶而已。性既畏客，客亦见畏。门屏之间，剥啄都尽。亭午深夜，坐榻隐几，焚香展卷，就笔於研，取丹铅而仇之，倦则鼓琴以抒其志。”这段描写大致可看出胡应麟之读书生活。所以王世贞称胡应麟“负高世之才，竭三余之慕，穷四部之籍，以勒成乎一家之言。上而皇帝王霸之猷、贤哲圣神之蕴，下及乎九流百氏，亡所不讨覈，以藏之乎名山大川。间以余力游刃，发之乎诗若文，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，不胥而驰乎四裔之内，其为力之难，殆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。”所以，他称赞说：藏书到胡应麟时才能说是真正的藏书，读书到胡应麟时才能说是真正的读书，即读尽了藏书，利用了藏书。

胡应麟的二酉山房藏书数达四万多卷，经部书有370种，3660卷，史部书有820种，1124

4卷，子部书有1450种，12400卷，集部书有1346种，15080卷，合计42384卷。

## 二、胡应麟与《少室山房笔丛》

明统一中国后，使元代衰微的文史之学复振。历史琐闻类的笔记，成为明代笔记中最茂盛的一枝。自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大约三百年的朝政兴废、典制变迁、文坛面貌、士人言行以及里巷传说、民情风习等等，都有具体的记载。明中叶后，不如以前的崇尚实学，故发空论、志杂感的随笔增多。考据辨证类的笔记，以丛谈杂著之类为成就较高。明代笔记中有一种兼载丛考杂辨与琐闻故事的综合性著作，篇幅较大。因为是考据辨证类著作，号称博学，也就是贪多，记载失实，考辨错误，张冠李戴，繁琐哲学的情况时有发生，但这类著作通过材料综合、分析、考辨，还能为我们积累材料，发现线索，解决疑难，特别记载的轶事琐闻，现在仍富有参考价值。

明代考据辨证类笔记较多，其中综合性的笔记比较著名的有：何良俊的《四友斋丛说》三十八卷，谢肇淛的《五杂俎》十六卷，其中胡应麟的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四十八卷，在学术上影响较大。

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全书共分十二部分，《经籍会通》四卷，考论图籍的撰著流传收藏情况；《丹铅新录》、《艺林学山》各八卷，为驳斥杨慎考据的误谬；《史书占毕》六卷，论史书、评史事；《九流绪论》考论诸子百家的源流、得失；《四部正伪》四卷，辨订古代伪书；《三坟补逸》论述汲冢遗书，即专论及《竹书记年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书的情况；《二酉缀遗》是采掇古书中的奇闻怪事；《华阳博议》杂记古人博闻强记的故事；《庄岳委谈》议论杂事，以纠正俗说之附会；《玉壶遐览》和《双树幻钞》分别谈论道教、佛教。由以上各类可知其内容之广博。不仅如此，书中有些记载也是参考价值较大的，内容的综合性、资料的可参考性，往往为后人重视。鲁迅在开给许世瑛书单中列出中国古典文学十二种参考书中，就开列了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一种。

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共分十二类，每类有一小序，概述本题的内容和主旨。有些类下分卷，又说明主题于卷首，体例较严，且引书注明出处，比之同类著作又稍胜一筹。陈文烛作序称此书“索诸九丘之远，论于六合之外。称文小而旨极大，举类迹而见义远，辨往哲之屈笔，闻者解颐。反先代之成案，令人心服。”当然是夸张之辞，但此书比之同类著作，从内容到编辑体例较好是公认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此书“徵引典籍，极为宏富”。但也指出其中引书错误不少。

胡应麟写作《少室山房笔丛》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。他谈到写作的经过时，曾说“余少而好史，占毕之暇，有概于心，辄书片楮设篋中，旷日弥月，鬻鬻数十百条。”正因为长期积累材料，所以一旦集中分析运用材料，就能写成包罗面广，涉及各方面的著述。如《史书占毕》部分共六卷，共分四个专题，内篇，外篇，冗篇和杂篇，“内以辨体，外以辨时，冗以辨诬，杂以辨惑，于前人弗求异也，亦弗能同也。”为什么书中能做到于前人弗求异也，亦弗能同也，正是由于胡应麟长期积累材料，充分占有材料，不盲从古人的说法，所以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
此外，胡应麟还广泛地利用书证。这种方法是可取的。如写作《九流绪论》时，“于诵读之暇，遍取前人铨择辨难之旧，以及洪氏《随笔》、晁氏《书志》、黄氏《日钞》、陈氏《解題》、马氏《通考》、王氏《玉海》之评诸子者，及近粤黎氏、越沈氏题词，复稍传诸

作者履历之概，会为一编，时自省阅。”至于写作《丹铅新录》、《艺林学山》时，正因为广泛阅读典籍，且态度认真，不强解辞语，不妄下判断。虽然是辩驳性著作，故也能做到指出杨慎的错误，又能有所阐发，学术价值提高了。

### 三、胡应麟文献史研究之成绩

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《经籍会通》四卷，作序引於万历己丑（十七年）孟秋，即公元1589年秋。他作此篇的目的是考史实、记见闻，借史实以发感慨，存文献提倡重视图籍。他说：“前代校综坟典之书、汉有略、晋有部、唐有录、宋有目、元有考。志则诸史共之。肇自西京，迄于胜国。记列纂修，彬彬备矣！”肯定了历代书目“渊源六籍，藪泽九流，紬绎百家，溯洄千古。”是“文明之盛集，鸿硕之大观。”但他看到明代一些士大夫往往以为经籍艺文志“义非要切、体实迂繁、笔研靡资、岁月徒旷。”也就是说怕编制书目费时费力，又不为人们所重视，因此，他“掇拾补苴，间以管窥，加之棷藻，稍铨梗概。”总之，以为博雅之前驱。正因为如此，《经籍会通》这一部分是胡应麟对历代书籍编纂源流，图籍散失遗亡，典籍散乱、混杂，各代图籍刻印、收藏等情况作综合性、比较性的研究成果。是一种议论与记载合编、考辨与传闻相互为伍的古代文献史笔记，可供图书史、图书馆史、目录学史等研究者参考。

胡应麟在《经籍会通》中关于古代文献史研究的业绩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。

（一）记文献。《经籍会通》之编制，观其主旨在于考文献源流，记当代史实，故胡在各卷中抱着存文存事的目的，保留了有关书籍流传的重要文献记载。综而论之，胡记文献的方法主要有三种：一、全录。保留有关记载典籍的重要文献的全文，这方面有《旧唐书经籍志序》、《旧唐书后序》，这是反映唐代典籍聚散情况的文字。又有陆子渊的《统论》一则，记古今书籍梗概。王世贞的《二酉山房记》、欧阳修的《集古录序》、苏东坡的《李氏山房记略》、李清照的《金石录后序》，这些是反映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献，胡应麟也照录了。它们分别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典籍流传全貌，或反映了某个私人藏书家的典籍聚散，故全文照录，以资考证。二、摘录。有关典籍流传、图书分类、私藏聚散等资料，如叶少蕴、王明清、魏了翁、周密等之言论，荀勗、阮孝绪、郑樵、马端临等的图书分类类目，胡应麟都采取摘录的形式，并运用这些材料，作典籍聚散源流的研究，作图书类例的研究。三、记闻。记载所见所闻之当代材料。胡应麟记载自己所见所闻的明代中叶后书籍刻印流传情况，如书市的记载：“今海内书，凡聚之地有四：燕市也，金陵也，闾阖也，临安也。”“凡刻之地有三，吴也、越也、闽也。……其精，吴为最，其多，闽为最，越皆次之。其直重，吴为最，其直轻，闽为最，越皆次之。”这些记载和分析是中肯的，也是他长期收集资料、比较异同的结果。这些说法，都为后人所重视。

（二）考源流。《经籍会通》中之材料，胡应麟是作为融合古今、考证典籍源流而积累的，故考证源流，说明典籍起源，书目编制沿革，公私藏书聚散，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
胡应麟由博返约，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，运用发展的观点，集中地对典籍历史作了比较性的研究，所以，书中有些看法是参考价值较大的。

（1）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典籍的流传与演变。

在谈到典籍起源时，胡应麟说：“六经删修尼父，授受孔门，卷轴篇章，类崇简要。三坟丘索，湮没不传，以大易尚书较之，其体制居可识也。盖古文峻法，迥异浮靡，圣笔渊

玄，亡资藻饰，故卷之不盈篋笥，而扩之函冒乾坤。春秋而降，诸子百家兴而道术离。秦汉以还，骚人才士作而文学盛，此其盈缩之大都也。”他说明的观点是“则古人文籍、不必尽减今时。顾世类弗传者，良由洪荒始判，楮墨未遑，竹简韦编，既非易致，灵文秘检，又率难窥。”以上一段话，集中地说明了先秦至两汉时典籍的发展情况。按胡应麟的看法是典籍起源甚早，早期典籍流传由于受到制作方式的限制，所以留传下来的往往言简事该，也就是篇幅不大，或遭受其它原因，未得流传，故不能认为古代没有什么典籍流传。与此同时，他对印刷术发时和应用，是抱着极为赞赏的态度看待的。他说：“三代漆文竹简、冗重艰难，不可名状。秦汉以还，浸知钞录，楮墨之功，简约轻省，数倍前矣。然自汉至唐，犹用卷轴，卷必重装，一纸表里，常兼数番，且每读一卷，或每检一事，细阅展舒，甚为烦数，收集整比，弥费辛勤。至唐末宋初，钞录一变而为印摹，卷轴一变而为书册，易成难毁，节费便藏，四善具焉。邈而上之，至於漆书竹简，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。”他不仅肯定了典籍流传新的必然要胜过旧的，而且认为印刷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。

(2)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典籍聚散情况。胡应麟在评论典籍聚散时，运用比较的方法说明历代典籍之流传。他说：“大抵历朝坟籍，自唐以前，概见隋志，宋兴而后，通考为详。第其卷帙之数，往往异同。缘诸家辑录，或但记当时，或通志一代，或因仍重复，或节略猥凡。故刘班接迹，繁简顿殊，三谢并兴，多寡悬绝。即博洽之流，勤于论覈，而疑似之迹，未易精详，今袖绎群言，旁参各代，推寻事势，考定异同。”他举出了汉以来各代典籍之记载不同，及自己的考证评定的数目。如：

“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。刘歆《七略》总目，《旧唐书》九十作九百非是，据班志所省十家三百余篇，而所增又数十篇，仅得后数，与此不合，然他无可考。”——这是对西汉时典籍的数目考定之意见。

“宋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。谢灵运所校。《隋志》以为六万。案六代间书尚难得，晋渡江才得三千。孝武时三万，恐亦重复，宋初何遽能尔，当以《旧唐书》为正。阮氏《七录》数同。”——这是通过各种材料分析而判断宋的藏书数目。

(3)用材料补充前人记述之疏略。这是胡应麟考源流的主要方法。胡应麟在摘引前代史志和学人记述历代典籍散亡之材料后，总评曰“牛弘所论五厄，皆六代前事。隋开皇之盛极矣，未几皆终于广陵。唐开元之盛极矣，俄顷悉灰于安、史。肃、代二宗，宥加鸩集，黄巢之乱，后致荡然。宋世图史，一盛于庆历，再盛于宣和，而女真之祸成矣。三盛于淳熙，四盛于嘉定，而蒙古之师至矣。然则书自六朝之后，复有五厄，大业一也、天宝二也、广明三也、靖康四也、绍定五也。通前为十厄矣。”这里大略的把明代以前典籍聚散之发展史勾画了一个轮廓。

在补充说明问题时，胡应麟很注意运用书面材料，以明言之有据，如评论历代书籍之厄时，他认为除了火之灾外，还有水之灾一项，他引用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后序之记载唐初书籍西运时漂没之事，又补充说董卓迁都亦是载舟西上，书籍因遇寇盗，亦沈溺河中，仅数船存。又隋代书籍焚之广陵，亦引杜宝《大业江都记》之说。总之，以博学家的旁征博引风格，多方引证材料以明事实。

(三)评得失。胡应麟在检阅历代史志目录、公私目录的基础上，综合评论各家书目优劣，分析类例得失，对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比较科学的总结。长期以来，人们对宋的郑樵、清的章学诚在目录学研究上的贡献，多所论及，而对胡应麟在明代承先启后的作用无所论及，这是不公平的。

胡应麟在目录学研究上注意分析历代书目编制的客观因素，从而评论各种书目的成败得失。他说：“历朝诸史，志艺文者五家。〈前汉〉也，〈旧唐〉也，〈新唐〉也，〈隋〉也，〈宋〉也。班氏规模〈七略〉、刘昫沿袭〈隋书〉、〈新唐〉校益〈旧唐〉、而〈宋史〉所因，则〈崇文〉〈四库〉等目也。”他指出历朝史志目录之因革后，接着认为“中垒父子，奕叶青缙，纪例编摩，故应邃密，第遗书绝寡，考订靡从。”这就肯定了刘氏父子的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体例上的完善，但因为当时遗书不多，无从参互校订。接着他肯定隋志“类次可观”，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本朝著作“大为疏略”，参考价值受到限制，但对新书间增补新，可称“精详”。“欧阳〈宋志〉，紊乱错杂，元人制作，亡足深讥。”他认为造成史志目录的疏略，主要是因为历代编写史书的人，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纪传里，又论序也花气力不小，志、表都是放在第二位的，当然经籍一类就不会费很大力气。而且一个人也不能通晓各种学科门类的知识，所以，史志目录中的分类，著录必然会出现一些缺点。

史志目录之作用是很明显的，胡应麟说“原夫艺文之为志也，虽义例仍乎前史，实记述成本当时。往代之书，存没非无以考，今代之蓄，多寡非此无以征。”肯定了史志目录在考察文化学术发展上之功绩。他认为刘知几批评《隋书》的经籍志，不是正确的看法。

胡应麟注意比较不同书目编制的特点，从而评价书目的优劣。如他认为“郑氏艺文一略，该括甚钜，剖核弥精，良堪省阅。第通志前朝，失标本代，有无多寡，混为一谈。”同时，因只记载以前著作，没有提要，所以，前人著作的宗旨，则无从讨论。指出了《通志艺文略》体例上是严密的，但著录较简，则是一缺点。而对于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一书，他说“番阳〈通考〉，以四部分门，实因旧史，而支流派别，条理井然，且究极旨归，推明得失，百代坟籍，焯如指掌。倘更因当时所有，例及亡篇，咸著品题，稍存故实，则庶几尽善矣！”肯定了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的编例完善，但因对过去亡佚图书没有考证，也有所不足。

胡应麟综合比较公私书目和各家艺文志，以及郑〈志〉马〈考〉等，他设想中的目录要能起到“庶千载简帙之废兴，万氏编摩之得失，一目可以尽其大都。”按照他的设想，编制书目应该广泛收集遗书，参考各家书目记载，记述各家的评述意见，对当朝文献全部收录，然后以己意列其指归，析类分门，总为一集，也就是综合郑、马之优点，通记古今之有无，分析门类，评述主旨。应该说，这种工作作为一人之力是较难完成的。但是，他的看法已具有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之认识，而他设想的目录，到了清乾隆年间，经过众人之手，才得以编成评论古今著作之目录学巨著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